



MAKESIZHUYI
ZHONGGUOHUADEDIANFA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李佑新 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蒋 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蒋 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网 址：<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湘潭沁园春印刷中心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10 字数：260,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55-4378-2/G·4373

定 价：15.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思想追溯	1
第一节 准备阶段	1
第二节 萌芽阶段	6
第三节 形成阶段	14
第二章 抗日主题	24
第一节 主题变换	24
第二节 统战策略	40
第三节 抗日与民主	62
第三章 军事绝唱	72
第一节 独创体系	72
第二节 弱者战略	88
第三节 兵家智慧	105
第四章 两论源流	117
第一节 两论背景	117
第二节 从政治军事著作到两论	129
第三节 传统哲学的继承与转化	149
第五章 革命蓝图	162
第一节 老问题，新问题	162

第二节 中国式的革命理论	177
第三节 独特的社会模式	193
第六章 实事求是	207
第一节 旧瓶新酒	207
第二节 的矢之喻	217
第七章 文艺方向	232
第一节 《讲话》的背景与视角	232
第二节 文艺与革命	240
第三节 文艺与人民	248
第八章 政党建设	263
第一节 重大课题	263
第二节 基本特征	270
第三节 独特方式	283
 附录一：青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思想关系及其湘学渊源	293
附录一：毛泽东与曾国藩 ——兼论湘学传统的特征	304

第一章 思想追溯

毛泽东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有必要回顾与追溯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当然,这里不可能详尽描述这些阶段中的各个方面,而只能关注那些与“成熟”相关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准备阶段

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毛泽东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汪澍白先生曾把毛泽东早期思想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准备阶段,颇为确切。“准备”的涵义有许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毛泽东思想的特色。

一、改造思想与改造社会

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发动时期。“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

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年毛泽东形成了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来改造社会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认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①中国之所以积弊太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②

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青年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从枝节入手,诸如议会、总统、军事、实业、教育等等。“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③他分析了近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是末,是枝节,唯有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才是本,只有探得哲学上的“大本大源”,才能抓住根本,其他可迎刃而解。

其次是“普及哲学”。青年毛泽东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不自知”,“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④要改变这种状况,毛泽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东认为只有普及哲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喘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①。因此,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②

其三,普及哲学的依靠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青年毛泽东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只有君子之士有高尚之智德:“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③圣人探得了“大本大源”,因而能够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和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毛泽东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切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主张入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皆为圣贤”,愚人贤人“共跻圣域”,一个理想社会就会到来。

青年毛泽东关于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其一,所谓抓“大本大源”,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追寻“大本大源”,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其二,所谓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极大地突出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青年毛泽东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心之力》。他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还主张人之心力与体力一起,任何事情都可办成。可见,突出主体能动性是青年毛泽东的一大思想特色,尽管这是非常抽象的。但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改造,被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表述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其三,探寻“大本大源”、“普及哲学”,表明青年毛泽东极为重视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这一倾向贯彻毛泽东的一生,而在延安时期尤为明显。

二、务实精神与国情研究

毛泽东早年即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思想有所涉及并有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主张知行并重。如果说他关于全力探讨“大本大源”的思想是重“知”的话,那么,他同时又强调“行”的意义与作用,具有突出的务实作风。那时候同学中就有所谓蔡和森是理论家,毛泽东是实践家的说法。

在知行先后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归本于朱熹,认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①他之所以主张全力探讨“大本大源”,就是基于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但是,知先行后并不排斥行的重要性,朱熹就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②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本来并不纯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如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成圣成贤,必须去行。所以,知行关系的论辩,虽有先后、难易、轻重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知行统一,突出“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青年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就说:“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故学者犹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③这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讲堂录》中就写道:“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强调:“凡吾思想之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由此他得出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② 朱熹:《朱子语类》。

③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的结论。

如果说,这种“行”还仅仅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那么,青年毛泽东所接受的十七、十八世纪“经世之用”思潮的影响,却表现出一种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杨昌济先生的讲课,认为“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①。颜习斋、李恕谷最重一个“习”字,注重实践和实际锻炼,这是杨昌济称颂和可取之处。他还推崇顾炎武,在讲课中多次征引顾炎武的话,并在“修身问题”中要学生“试举顾亭林之学说”^②。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记下了老师的讲课内容:“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这正是炎武精神,顾炎武反对专门的修身养性、空谈义理,而主张求证于事物,“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讲堂录》还摘抄了潘耒为顾炎武的《日知录》所作的序,称赞他“尤留心当世之故”,“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国事民生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以及“足迹半天下”的实地考察的实践精神。《日知录》之作,顾炎武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③毛泽东小时就读过《日知录》,对顾炎武的“志”与“业”有粗浅了解,与同学谈心,曾引顾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相勉。一师时期,加以老师提倡炎武之学,更是备受影响,对炎武的“留心当世之故”、“足迹半天下”的实践精神不独倾心服膺,而且躬躬践履,曾经与同学肖子升徒步走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游程千余里,深入湖南农村,了解风俗民情,去读所谓“无字之书”。

从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的务实精神与实践风格。他完全投身到了社会实践中,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发动“驱张运动”与“自治运动”,领导湖南的“五四”斗争。为了有效地改造社会,他强调要从“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

①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②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第三卷,“与友人论学书”。

话”^①。在出国留学热潮中,他自己慎重地考虑了去留,并且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②为此,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③。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是开列出 100 多个调查项目,想切切实实地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青年毛泽东的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这一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不说与他早期的上述思想特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节 萌芽阶段

建党至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所谓“萌芽”,也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涵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其主要标志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以及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一、初步设想

青年毛泽东是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亦即他所说的探求“大本大源”)和强调研究国情的基础上,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一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实际的研究结合起来,“着手老老实实在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这些思想可以看作是后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于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以及如何进行革命,开始是不大清楚的。后来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逐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性质。即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如果仅仅这样去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远未认清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事实上,当时陈独秀就把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看作是一种纯粹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提出了相应的但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策略。

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在1923年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北京政变与商人》中也作了分析,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②,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决定中国现阶段进行的革命,只能是“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③。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毛泽东把这种资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③ 见《政治周报》,1926年1月10日。

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但他这时的文章还只是按照党的“二大”的精神，去论述与宣传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对象。但是，到了大革命时期，随着五卅运动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充分表现，随着他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政治态度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朋友、革命的主力、革命的前途等等。他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设想。

关于革命的特点，毛泽东明确地把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与以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他说：“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①毛泽东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欧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从而科学地论证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特点。

对这种区别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中国资产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作了出色的分析与论述。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他就在全党最早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他指出，商人阶级虽然要求革命，但可能“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误上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征作了全

^① 《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面深入的分析。其一,从总体上来看,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①其二,从具体情况来看,还可以区分“纯民族资产阶级”和“半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与帝国主义联系较少,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慌”^②。至于“半民族资产阶级”,常与买办阶级的界限不能“截然划分清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有时也能勉强革命,但“只要国民革命斗争加强,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其三,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把它当作革命的朋友,肯定其革命性,但要时常“提防”其妥协性;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要严防他们背叛革命。这一分析和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得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23年4月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中共“二大”《宣言》是一致的,认为“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③。以后,随着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认识的深入,他对革命动力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精细地计算了革命的力量,明确指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 见《革命》第4期,1925年12月1日。

③ 见《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种分析，突出了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同时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做了具体分析。并且，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早发表的文稿中，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与作用，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②

由于革命的动力变了，革命的目的与前途也就发生了变化。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问题时，指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这既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深刻理解，同时也说明了他对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目的与前途的认识。虽然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但革命的结果却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时期，毛泽东反复论证了资产阶级企图建立其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毛泽东在1926年1月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的时代、性质、对象、动力、目的与前途，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论证了中国革命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其中尤其还论述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在于国内“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

① 见《革命》第4期，1925年12月1日。

② 见《革命》第4期，1925年12月1日。

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的有力的后援”^①。虽然这时毛泽东还未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却已见萌芽。

二、倾心农民

如果说上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萌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那么,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实践与理论则表明他使这种结合前进了一步;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萌芽表明他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那么,他关于农民运动的实践与理论则表明他接近探索出中国式的独特的革命道路。

建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革命实践的重点是从事城市工人运动,虽然也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毕竟对农民革命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迫切性认识不足,仍然束缚于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心论。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全力关注农民问题。但是,五卅运动中社会各阶级的特性的展示,使得农民问题开始吸引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1925年2月8日,毛泽东利用回韶山养病的机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并着手研究农民问题。他在1925年11月21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事业”和“学业”二栏中,分别写道:“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中共“四大”以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认识到农民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农民运动上来。他主持了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组织和指导学员进

^① 见《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行农村调查；在有关会议上积极参与有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文件的起草与审查；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街谈巷议责难农民运动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他还主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全国农民协会的筹备，连署颁发全国农协的许多文件；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制定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计划等等。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专题论文、专题发言，起草或参与起草关于农民问题的宣言、决议、提案，以及其他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著。可以说，他这一时期在实践上全力倾心于农民与农民运动，而在理论上则对农民问题作了出色的深刻的说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

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时，中心主题即是阐述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根据农讲所学员金绍的听课笔记，毛泽东从人口、生产、历史以及革命的力量与目的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核心地位。首先，他认为，只有农民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国民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其中，地主阶级（主要是大地主）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对象”，因为军阀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帝国主义统治只是这个经济基础的代表。农民不起来推翻地主阶级，也就不能摧毁宗法封建经济，从而也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其次，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力量中的最大力量。革命力量包括工人、农民、中小商人、学生与士兵，国民革命即是工农商学兵联合的革命，但“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有百分之八十，当有三万万二千万以上”，“工农商学兵等五种人，惟农民最多”。所以，农民是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摧毁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基础的直接的最大力量。其三，毛泽东认为，农民的解放是中国社会中其他被压迫阶级解放的前提。无论是工人、商人，还是学生、教师或士兵，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